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次

《短篇書評》

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	林宣佑 1
Nayef R.F. Al-Rodhan	Symbiotic Realism: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 Instant and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徐子軒 6
Steven Levitsk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陳方隅 12
Elmer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陳芙萱 17
AnnaLee Saxenian	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創業家的網絡競爭力	劉皓仁 21
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鄭楷立 25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三年八月 第三十八期



資深編輯顧問	王業立、石之瑜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鄭楷立、嚴博瀚
編輯委員	江俊宜、江俊儒、吳添成、李天申、陳子瑜 陳瑋鴻、廖斌州、魏龍達、蘇慶軒、蘇軍瑋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

卜睿哲

林宣佑/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一、前言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C. Bush)從《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與《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兩本著作開始，聚焦美中互動背景下的東亞局勢。兩岸關係從2000年民進黨政府上台開始到現在，歷經臺灣內部政黨輪替，對中政策出現轉折，當然中國大陸對臺政策也有所調整。對於兩岸關係這十年來的波動震盪，同樣是處理兩岸關係議題，《台灣的未來》著眼於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時期，而其新作《未知的海峽》則處理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第一任期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不只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策態度出現轉變，整體國際局勢在這些年亦有所改變。兩岸關係做為美中矛盾點之一，國際局勢改變，勢必影響到美國對此議題的戰略考量：要不要放棄臺灣？該戰略清晰還是模糊？或言如何清晰？怎樣模糊？卜睿哲此書即從理解馬英九主政時期以來，兩岸在政治、經濟與安全面向的發展，離析出兩岸看似穩定互動所存在的隱憂。並就美中台三方的角度思考，該如何應對新局勢下兩岸關係根深柢固的矛盾，更某種程度上回應美國內部爭辯臺灣是否仍具戰略價值的討論。



書名：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

作者：卜睿哲(Richard C. Bush)

譯者：林添貴

出版者：遠流

出版地：台北

年份：2013

頁數：300 頁

ISBN：9789573271673

二、內容

本書共分成 11 章，除了緒論與結論外，主要可分成三大區塊，首先為探討馬英九第一任期兩岸關係的概況，發展出兩個互動典範，詳細探究兩岸在經濟、政治與安全等面向趨於穩定的背後，根本的矛盾是否因關係改善而被粉飾了？還是雙方交流到一定程度後，反而被突顯了？第二個區塊則是討論權力不對稱典範下在經濟、政治與安全面向上的適用性；第三個區塊則較具政策建議色彩，探討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在新形勢下，如何面對矛盾與核心利益的變與不變。以下將就三大區塊的內容依序進行說明。

國民黨馬英九於 2008 年上任，就卜睿哲的觀點，兩岸關係由「有衝突的共存」走向「穩定」。書中明確地區分「穩定」與「基本爭議解決」，兩岸關係在馬英九主政第一任期走入「穩定」並不代表「主權」與「安全」的基本爭議已經解決，但穩定卻能營造有利解決爭議的環境及條件，而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提出兩種可能的互動典範，分別是「相互說服典範」，其二為「力量不對稱典範」。前者意指雙方用彼此能接受的態度與條件，在可接受範圍相互讓步，重點是此相互說服如何具體化成可行的過程。力量不對稱典範則指以強制方式壓迫對方接受

自己的意志。卜睿哲認為馬英九第一任期兩岸關係屬相互說服典範，其書中就以該典範的視角就馬政府第一任期內的經濟、政治與安全面向予以分析。

就經濟面而言，馬英九第一任內與對岸簽訂多項協議，例如引起國內朝野高度辯論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兩岸的經貿互動朝向正常化、制度化與自由化。正面肯定之餘，作者認為此發展趨勢仍會面臨瓶頸，例如臺灣與中國大陸政經體制的差異會反映在規定的適用與標準的認定上，再者，全球化潮流讓雙方經貿談判觸及臺灣經貿國際空間（帶有主權意味）的相關議題，這些都是簡單的果實已採收後勢必會面臨到的狀況。

就政治與安全面而言，卜睿哲認為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內，此層面的進展相對有限，因牽涉到兩岸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基本爭議。作者在書中舉中方曾主動放出「政治協商」風聲最後仍無疾而終的例子來說明難有進展的原因。同樣地，包含「信心建立措施」在內的「兩岸和平協議」亦因臺灣內部對可能喪失主權的疑懼及中國大陸不願明文放棄對台動武等因素而無更具體進展。不過，在此卜睿哲拋出一個疑問，如果中國大陸對相互說服典範的成效不滿意，是否因此轉以權力不對稱典範？

在此就來到本書第二區塊的內容，也就是探討權力不對稱典範在經

濟、政治與安全層面的應用及可能的影響。此典範預設影響力與國力是正比的關係。書中引 Robert Sutter 的研究，說明中國大陸在過去案例中懂得操縱槓桿力量來達成自身目標。不過卜睿哲認為臺灣內部擔心的「中國大陸是否會操弄經濟槓桿逼迫臺灣屈服」就其評估起來發生機率不至於太高，原因在於經濟制裁的效果可能有限且有兩面性，會同時傷害到中國大陸自身；不過，軍事方面，雖然中共解放軍採取直接武力攻擊機會較低，但作者對中方持續增強兵力，拉開臺灣與中國大陸間軍力差距的現象表示擔心，因不對稱軍力差距所產生的恫嚇效果，同樣能迫使臺灣屈服於中國大陸的意志。除此之外，書中探討孫子的戰略，認為或許中共會考慮「不戰而屈人之兵」，透過多層次施加一定程度的槓桿力量，壓縮臺灣可選擇的空間，最後達成目的。只是這個情節是在中國大陸放棄相互說服典範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情境，勢必須更深入了解兩岸關係三位最重要行為者：臺灣、中國大陸與美國未來的策略選擇及應對之道。

本書第三區塊即是從臺灣、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角度來論述。對臺灣而言，卜睿哲認為除了鞏固馬英九政府第一任的收穫之外，其同意 Phillip Saunders 的論點，強調臺灣更需透過其他作為增強面對崛起之強大中國時的信心，特別用以減緩經濟及軍事恫嚇

槓桿力量所可能產生的衝擊。這些增強臺灣自身信心的作為，包括政黨之間理性討論大陸政策路線，經濟自由化的對象需擴及到其他貿易夥伴，以避免成為中國的經濟附庸等等。安全方面，增強軍事力量（須具有可信度）及深化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是作者認為可提升臺灣信心的作為。

就中國大陸方面而言，卜睿哲認為仍應堅持相互說服的典範，畢竟兩岸關係的發展頗受世界矚目，也會深刻影響到他國對中國政經軍力量迅速擴增的理解與評估。書中並點出，中國大陸「防獨以促統」策略的盲點，首先臺灣內部認同分布絕對不是單純「統獨」二分如此簡單，而妨礙統一的主要障礙，也不是部分追求臺灣獨立的力量，而是反對一國兩制的廣大社會主體。就此，卜睿哲也順道對中國大陸一直很反對美國涉入兩岸關係之事提出辯護，認為美國提供臺灣軍事力量是提升臺灣與中國大陸談判的信心，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臺灣會因對中的弱勢感而不願與之進行談判。

對美國而言，在兩岸關係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其實也牽動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戰略利益。隨著美中之間的權力差距持續縮小，美國內部對臺灣是否還具有戰略價值的辯論更趨熱烈。棄台論學者主張對臺的安全承諾只會成為美中交往的包袱，臺灣走向「芬蘭化」反而有利於避免美中之間出現

衝突。卜睿哲的觀點則是認為，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同會影響到其他有正式軍事同盟關係的國家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從而影響到美國與那些國家同盟關係的穩定。除此之外，美國如果在臺灣議題上選擇棄守，中國大陸在「霸權與崛起強權情境」下，對此「讓步」將會使中方在其他議題的態度更難以溫和。就此判斷，本書作者認為縱使美中間的權力差距出現改變，美國仍須在兩岸關係當中扮演一定分量的角色，只是所扮演的角色已從陳水扁時期的「促談調解人」變成是「面臨有更錯綜複雜細節」的中間人。

三、評論

兩岸關係在近十幾年間出現起伏甚鉅的波動，透過本書的分析，其實可更深刻地看到影響兩岸關係變動的因素，或言臺灣、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兩岸關係議題中所需考量的面向既深且廣。美一中一臺三角關係中，涉及美中這組國際政治學界相當重視的雙邊關係，也有與我們最切身相關且彼此基本立場相衝突的美臺與中臺關係。卜睿哲在書中也談及臺灣內部政治運作與人民意向如何影響臺灣領導人對陸及對美政策。

除此之外，卜睿哲也提醒我們，在兩岸之間看似穩定的局面，也別忘了基本爭議仍未被解決的現實。「維持

現狀」並不代表坐以待斃，或成為無所作為的藉口。本書以相互說服的典範與權力不對稱的典範來粗略劃分兩岸互動的類型，透過這樣的分類，更系統性地思考如何讓兩岸都更有意願待在相互說服的典範，而非以更易造成衝突的權力不對稱典範來解決問題。

在兩岸關係這個議題當中，就權力轉移理論的角度，同樣存有潛在衝突的是美中基於權力拉近所產生的緊張與摩擦。如果就兩岸之間的互動讓至少其中一方失去耐心，而往權力不對稱典範的方向移動，兩岸關係作為美中權力競逐的一環，惡化的兩岸關係是否會因此挑動美中之間敏感的神經，亦是值得注意的。

不過，就卜睿哲的觀點，美國在兩岸關係當中應該要當作調解中間人，在情勢惡化必要時採取雙元嚇阻穩定台海情勢，也能避免讓美國陷入戰爭。這樣的觀點符合美國長久以來在兩岸關係所持的立場，只是此觀點預設美中間無緊張的情況下，兩岸出現緊張衝突。不過，同樣值得思考的情境是，如果牽引美中往緊張方向移動的因素並非惡化的兩岸關係，而是美中基於權力接近所導致的呢？此時兩岸關係雖不是造成美中關係惡化的主因，卻是受影響最大的。「在該情境下，美中臺各自該如何回應？」這點卜睿哲在書中未談及，不過卻是處在兩強狹縫中的臺灣應該思考到的狀

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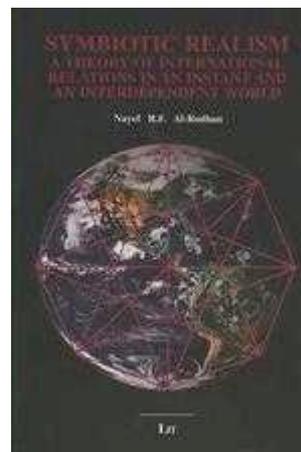
最後，卜睿哲對棄臺論的反駁也值得注意，從是否要放棄臺灣的辯論中可以發現，兩岸關係在承平時期的重要性較無法突顯，但會在某些關鍵時刻成為美中之間推測對方意圖與鞏固盟友信心的重要指標。

Symbiotic Realism: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 Instant and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Nayef R.F. Al-Rodhan

徐子軒/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在全球緊密相連的今天，既有的國關理論儘管仍存在著解釋效力，但針對一些過去較少處理的議題，卻有著力不從心之感。即便是傳統的安全議題，至今也與冷戰時期有了不同的面貌，亦即，一國的安全不再是僅依靠獲取權力的策略，更大部分來自於和他國的合作。是故，如何改善理論遂成為當代學者的必要課題。為了讓政策制定者能清楚地理解全球治理的脈絡，Al-Rodhan 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研擬了一個新的研究途徑－共生現實主義(symbiotic realism)。他之所以會以現實主義做為基本理論架構，乃是因為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的判讀具有一定的基礎，例如，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道德不能做為行為的依據，畢竟國際間始終缺乏絕對的權威，仍是無政府狀態。不過，共生現實主義也認為隨著互賴的增價，國家間終將進入共生的關係，所謂共生，意謂兩者或多方有著互賴的關係，且能允許其中一方獲得比他者更多的利益，又不至於引起衝突的情況。可以發現，共生現實主義反對傳統現實主義相對獲利的觀點，偏向絕對獲利，強調國際關係中的博弈並非零和遊戲。基此，國與國之間便不會以制衡行為相待，而體系中也會出現一個負責任的霸權，這個霸權可以調和各國的利益，並阻止可能出現的威脅(Al-Rodhan, 2007: 14)。



書名：Symbiotic Realism: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 Instant
and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作者：Nayef R.F.
Al-Rodhan
出版者：Transaction
Publishers
出版地：Zurich : Lit ;
Piscataway, NJ
日期：2007
頁數：160 頁
ISBN：9783825804770

進一步而言，共生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如下：包括了強調神經生物機質的人性(neurobiological substrates of human nature)面向，意指人的偏好不僅是理性自利的，也有著追求身分認同或是群體歸屬感的因素、現實主義的硬核 - 全球無政府狀態(global anarchy)，意指國際仍無最高權威可以主控一切，但雙方或多邊關係可以調和這種緊張、資訊時代的即時連結性(instant connectivity)，意指各行為者的連動性較以往更高，也有著跨國行為者牽涉其中並左右國際關係發展，以及向新自由制度主義取法的互賴(interdependence)，意指國家間因經貿和社會流動，使得各國的依存度相對提升，依存越高代表很難脫離具有夥伴關係而獨立生存。這四個面向肇因於全球化，且環環相扣形成系統性的動態(Al-Rodhan, 2007: 10-11; 98-99)。準此，就物質與理念兩方面觀之，均需要一種能克服無政府狀態的治理架構，透過此種架構，人性得以確保基本的需求，而國家亦能在互賴與連結性中獲得滿足。

為了更準確的解釋國家行為，共生現實主義接受了雙元本體論(dual ontology)。一方面在國際體系中，霸權國的領導權力多基於同意而非強制，這說明認知與規範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物質面向；另一方面，國際間確實有些既定的條件如理性主義的假設，此即是所謂的配置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像是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但亦有透過行為者互動產生的權威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這類資

源是權力在全球體系中運行的結果，能協助行為者在構建物質權力，像是對於疆域的合法安排、條約的談判與制定等(Al-Rodhan, 2007: 12-13)。同時，共生現實主義也認知到其他要素在體系中的不可或缺性(見下圖一)，諸如跨國企業、國際組織與女權運動等非國家行為者，或是資源資源、通訊技術等物質動力，這些要素可以協助創造(甚至可以重構)全球秩序，但這不代表共生現實主義放棄了全球無政府狀態，而是企圖超越傳統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賦予其他物質與理念要素應有的地位。

在全球層次上，國家需採行多元主義，不只要與他國互動，也應與國際組織互動，例如在資源取得與環境保護等議題合作，以促進穩定的全球秩序。這是為了破除傳統現實主義的匱乏(scarcity)假設，強調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依舊能和平共處。在國與國之間，或是文明與文明之間，互賴是交往的關鍵，因為國家間最初的往來是透過貿易展開，而若要形成互賴體系，貿易必須是定期且巨量，這就得依靠跨國公司促進。此外，尚必須有其他的國際交往方式協助締造互賴的狀態，如資訊與通訊技術的緊密相連，除了經濟上的效益，也涵括了實體的建設，便可連繫國家的經濟命脈，顯示即時連結性讓互賴更形穩固。另一方面，在個體層次上，個人(主要是指國家決策者)與女性運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人性觀之，人類的行為基本上是由需求和恐懼等生存動機所驅動，故必須探索個體特殊的文

化，才能理解事物緣由。而女性運動有著特殊的議題設定能力，如強調非傳統安全、人權保障等，在女性力量漸漸崛起的今日，不能忽視其影響力 (Al-Rodhan, 2007: 68-91)。

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集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 的概念。在無政府狀態下，它可以凌駕於國家之上 (如歐盟)，可以是國家之間 (如東協)，亦可以是個體之間 (如華人)。職是之故，集體身分可以視為是一種流動的實體 (fluidity)，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改弦易轍，如即時連結性會讓一集體身分遇到其他集體身分，並產生互動。在互賴的國家間，形成某種集體身分對全球體系來說意義重大，因為人性存在著追求自我成就的欲望，反映在國家行為上，便可能演變為文化的傲慢與例外主義 (exceptionalism)，這將是衝突之源，會加深體系中的不安全感，而集體身分則可以減低，甚至進一步消弭此種狀態 (Al-Rodhan, 2007: 138-139)。

綜合觀之，共生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有著不小的差異。雖然兩者都接受關於均衡的概念，但前者更強調非物質因素的重要。不過，在整體理論架構上，現有的共生現實主義仍有缺失需要改善，主要是一致性與簡潔性。在一致性的方面，共生現實主義雖亦主張全球無政府狀態的重要，也指出互賴具有緩和的效應，這其實就跟新自由主義相去不遠，並非嶄新的途徑，更有甚者，共生現實主義與其他現實主義沒有相互呼應，如共生現實主義既然強調跨國與國家兩層次

的互動關係，卻沒有提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立場，又如強調集體身分的重要，卻沒有借鏡建構現實主義的方法。在簡潔性的方面，共生現實主義在三個意象上整理出了九個變數，雖涵蓋周全卻過於龐雜，又沒有賦予足夠可操作的定義，反而容易使得研究者與實務人員陷入混淆 (見圖一)。

又，關於政治經濟在外交方面的作用，現實主義者其實並沒有 (也不打算) 將之當作重要的變數。這在過去全球化尚未成形的時代尚能勉強提供解釋，但在後冷戰的世界中，國際政治的樣貌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尤其是全球經貿合作呈現空前緊密的今日，現實主義無論如何必須針對相互依賴有所回應。因此，部分現實主義者開始出現與自由主義整合的觀點，強調一國領導者在衡量選擇戰爭或平時，乃是基於和他國未來貿易的期望。但，即使雙方經貿互賴程度已高，若是對未來貿易的期望趨於悲觀，則戰爭亦有可能爆發，反之亦然 (Copeland, 1996: 19-20)。此結合了現實主義 (焦點在於探討國家的易損性，國家在中斷貿易後可能造成的傷害) 與自由主義 (焦點在於探討貿易的獲利如何讓國家避免戰爭) 的優點，可惜沒有提供足夠的實證資料加以測試。其問題在於以期望為中介變數的模型並無法針對期望做出合理的說明，關鍵在於理性主義缺少了一個關鍵變數，即是忽略了身分條件帶來的影響。試想，一次大戰前夕，德英貿易緊密相連，也沒有證據顯示未來會變差，為何又爆發了戰爭？即是德英的身分認同出現了差距，演變成種族對種族、

制度對制度，進而形成利益對利益的一次大戰。

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筆者認為現實主義(包括共生現實主義)應該要做出以下修正：首先，在國家層次上，共生現實主義是種具條件的理論，必須要符合兩項關鍵的要素，才能發揮作用。一是雙方的相互依賴，兩行為者固然可以透過經貿往來，建立起緊密的關係，但這種互賴狀況有其限度，在全球化的世界裡不能僅依靠另一行為者。¹二是身分，國家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必須要展現出系統性的對稱，也就是說，如要達成均衡，行為者在國際關係中既要認同自己也要接納他者，既不能完全放棄自我也不能完全追隨他者。²申言之，雙方的互賴

¹ 就相互依賴的定義而言，新自由制度主義指的是國家(或其他行為者)之間彼此影響的情形，其涵括了兩個要素，一為敏感度(sensitivity)，一為易損性(vulnerability)。在此基礎上，有學者界定了三種測量的標準，分別為附屬性(dependency)、開放性(openness)和獲利(gain)。附屬性近於敏感度，用以測量兩行為體之間的貿易關係，主要以雙方貿易數字占彼此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而論；開放性是測量一行為體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乃是以經濟生產的貨品交易為計算基準，此常用於計算一行為體整合至全球經濟的程度；獲利意指一行為體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這比較難以測量，因此也最具爭議(Mansfield and Pollins, 2003: 11-12)。一般來說，自由主義者比較偏好使用開放性與絕對獲利的概念，而現實主義者則偏好附屬性與相對獲利的概念。

² 特別要注意所謂集體身分，是角色與類屬認同的結合，即自我與他者間認同化(identification)。認同感的形成是一個過程，在此一過程中自我與他者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自我逐漸被歸入他者，自我和他者和為同一個認同，也促成自我產生利他性的行為的形成。根據Wendt的分類主要源自四種變數：1.相互依賴；2.共同命運(common fate)；3.同質性(homogenization)；4.自我約束(self-restraint)。Wendt將上述四種變數分為兩類，第一類包含

建立在一個巧妙的基礎上，這個基礎配合著身分認同便可以達成所謂的共生。

如同權力平衡之於現實主義，互賴也是自由主義重要的理論，其源自於古老的自由主義傳統：康德學派(Kantian)。在康德思想中，相互依賴至今已經發展出了三種脈絡，一為民主和平論，二為民主和平論，三為國際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GO)。由於本研究旨在建立通則性的模型，就民主和平論來說，其對民主國家的定義甚為嚴格，只有少數國家可通過標準，故在本研究中已先行排除，而IGO由於出現時間較短，缺乏足夠的實證資料，且與本研究之焦點不符，因此也已排除，準此，唯有經濟互賴成為在本研究中影響兩行為體之間互動的變數。此外，眾所皆知，在國關學界第三次大辯論後，產生了所謂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亦即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呈現理論互補的狀態，這便提供了將相互依賴概念引進共生現實主義的正當性與必要性。³

前三項變數(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是集體認同形成的主動或有效原因，第二類為第四項變數-自我約束，是集體身分形成的許可原因，當四個變數存在程度越高時，則集體身分形成的可能度就越大(Wendt, 1999: 318-360)。

³ 近來互賴理論的發展呈現了三波趨勢，第一波是始於貿易帶來和平的假設，研究顯示，如果雙方貿易越盛，可以降低衝突的可能性；第二波引起熱烈論戰，也是最多自由主義者所支持的論點，亦即貿易可以弭平爭端，而現實主義者也採用大量相同的實證資料支持自身的假設並攻擊對手，主張在某些條件下，貿易反會帶來衝突；在第三波中學界試圖將雙方的理論整合，藉以訂出一些先決條件，並限制自由主義的論述，這階段的理論則尚在發展中，主

承上所述，身分同樣是互賴理論中缺乏卻又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建構主義認為若是一方的互動結果取決於他方的決定，則是處於相互依賴的狀態，而經濟互賴式形成集體身分的必要條件，集體身分又是實現和平的必要條件。準此，相互依賴將有助於產生一個更多合作的體系，這是指透過一再重複的過程，互賴增加了合作的獲利，同時也加強了合作的制度化。在互動的過程中，各方原來的身分都會減弱，學習以他者的眼光來看待自我，也因之改變自我身分的意義。職是之故，相互依賴便能建構出群我意識，約束著參與者各方的行為。此外，一旦形成群我意識的雙元意義，在整個體系中便可能形成集體身分，從而締造國家間的和平，更進一步可與同質性 (homogeneity)、自我克制 (self-restraint) 等要素發揮作用，共同促進康德文化的產生 (Wendt, 1999: 344; 359)。

總的來說，結合了建構主義的互賴會產生不同以往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指從客觀到主觀的過程。在理性主義假設下的互賴十分注重客觀認知，因為國家行為者必須確實掌握到互賴的存在，互賴的和平效應才能發揮作用，而對於互賴成本的計算，也需要直接的數據評估。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認知方面的互賴可以強化(當然亦可以弱化)物質方面的互賴效應。因為建構主義的互賴乃是基於主觀集體身分，讓一行為者把對方的得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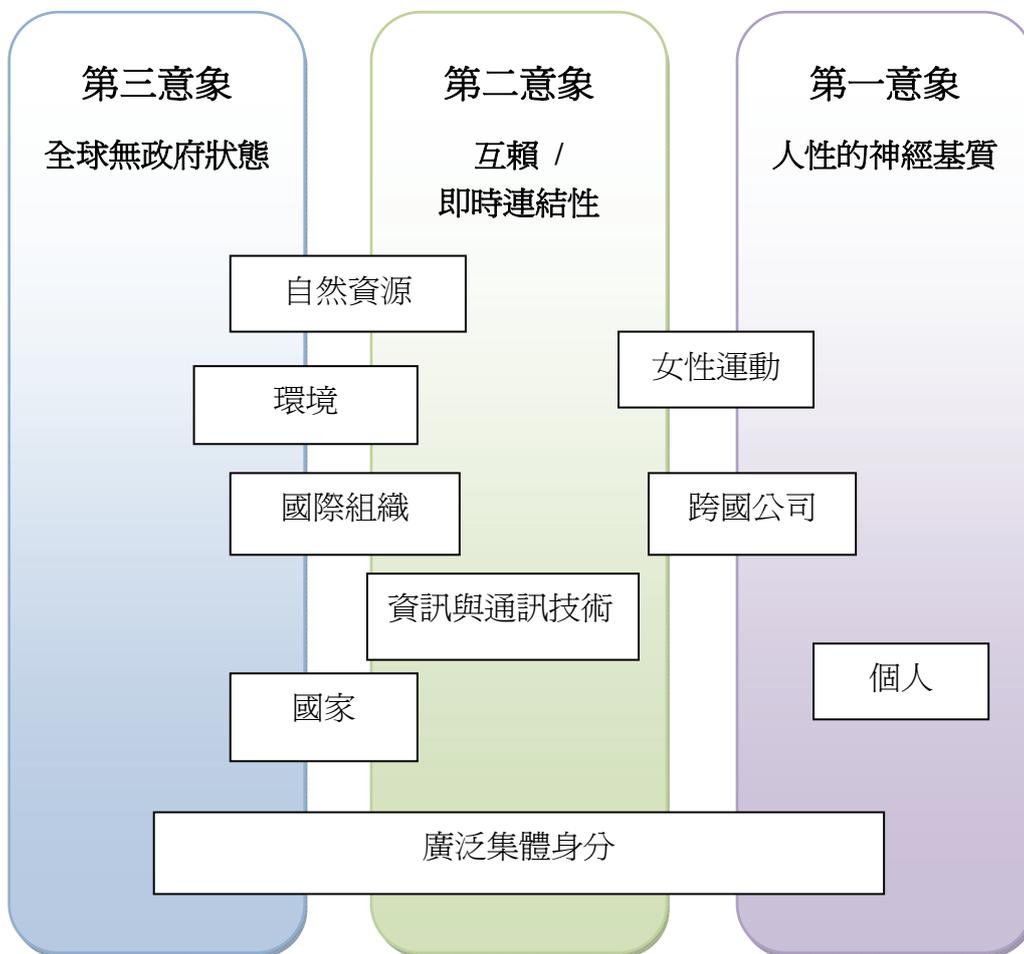
能當作自己的得失，而這種利己身分是需要透過不斷再造的社會條件，是一種複雜的學習過程，也將使得互賴的作用更形深刻，隨之形成共生結構。

參考文獻：

- Al-Rodhan, Nayef R.F., 2007. *Symbiotic Realism: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 Instant and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Zürich: Lit; Piscataway, NJ: Distributed in North America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Keshk, Omar M .G., Brian M. Pollins and Rafael Reuveny, 2004. "Trade still follows the flag: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a Simultaneous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Issue 4, pp. 1155-1179.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Brian M. Pollins. 2003.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An Introduction," in Mansfield and Pollins (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30.
- Copeland, Dale C.,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要是指使用次變數(sub-variant)輔以先前的研究，如互賴與民主和平、或貿易協定之間的關聯(Keshk, Pollins and Reuveny, 2004)。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pp. 5-4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一、共生現實主義的要素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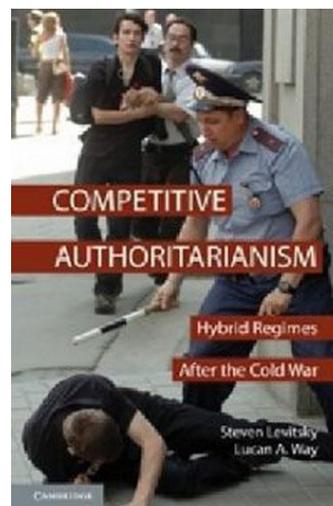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陳方隅 /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一、理論

自從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Huntington, 1991）以來，民主政治似已成為全球唯一具有正當性的政體型態，即使在非「自由民主」的國家，例如中國與北韓，統治者也都據此聲稱其正當性。此一聲稱與現實頗不相符的現象更普遍存在於第三波民主化的許多國家，亦是 Levitsky 與 Way 一書的核心關懷，也即坐落於民主與威權之間的「競爭性威權政體」。對於此一現象的概念化毋寧說明即使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後，政體轉型與民主化依舊是比較政治當中非常重要的次領域。

一個政體的轉型，不必然是「民主化」這個方向（Carothers, 2002）。許多獨裁政體或威權政體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事實上僅採用選舉這類的政治制度，但不賦予人民公平的政治權利，成為披著民主外衣的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學界已注意到該類政體的發展，例如 Olcott 與 Ottaway（1999）稱之為半威權政體（semi-authoritarianism），Zakaria（1997；2003）則稱之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期刊於2002年4月曾出版專刊討論，其中 Diamond（2002：30-31）延伸政體的分類為六大類，其中就包含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書名：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作者：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出版者：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日期：2010

頁數：517 頁

ISBN：9780521709156

Levitsky 與 Way 將混合政體的興起視為冷戰後的特有現象。¹ 其中，所謂的競爭性威權政體是指一個國家當中存在正式的民主機制（formal democratic institutions，尤指行政權或立法權的選舉），而且其被視為是決定政治權力歸屬的關鍵，但是統治者可以操縱選舉結果，² 使得「競爭」存在，但是並不「公平」（頁5）。傳統的威權政體不允許反對黨存在，但在競爭性威權政體當中反對勢力可以合法參與集會、結社、參政。兩位作者以1990年冷戰結束後為起點，依照選舉公平性、媒體自由度、反對黨的合法性，以及執政者對國家資源的控制度等標準（頁365-368），找出35個符合定義的競爭性威權政體，並且檢視所有案例的轉型因素與方向。簡單來說，轉型有三種結果：民主化，穩定威權（政權未輪替），不穩定威權（政權輪替，但未民主化）。

他們提出一個簡潔的理論解釋造成不同轉型結果的因素，主要的變數僅有三個：與西方國家的連結程度（linkage to the West）、統治者的組織力量（incumbent organizational power），以及西方國家的影響力（leverage of the West）。這三個變數可依序畫成一個枝狀圖解釋不同轉型結果。首先，最重要的變數是與西方國家的連結程度，國際因素是決定民主

化與否的關鍵。作者認為競爭性威權政體民主化的唯一因素即與西方國家的實質連結（例如經貿、外交、軍事），特別是與美國或歐盟的關係，例如墨西哥、尼加拉瓜，以及臺灣都是與美國高度連結而造成民主化。

與西方連結度低的國家則進入理論的第二階段——國內因素。如果統治者或統治的政黨擁有高度的組織能力，能夠運用強制性的力量維持政權，則競爭性威權政體將形成穩定的威權型態，例如辛巴威、波札那，以及莫三比克都是典型的案例。

當統治者在國內的組織能力低，則第三個變數將解釋政體的轉型。「面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力」是指一個政體在面對國際上的經濟壓力以及民主化的壓力時的脆弱程度（頁24），當西方國家的影響力高時，則限縮統治者使用強制力量維持權力的空間，政權易出現輪替而成為「不穩定威權」，例如喬治亞、馬拉威、馬達加斯加等國；當西方國家影響力低時，政權仍然維持穩定威權的形態，例如俄羅斯。在這個三階段的理論架構下，Levitsky 與 Way 分析了全部的案例，每個國家各用6至10頁的篇幅檢視政體的形成與發展，研究發現這個理論架構足以解釋35個競爭性威權政體的轉型。

二、討論

在研究方法上，Levitsky 與 Way 採用中等樣本（medium-N）的研究設計。未採用統計模型是因為個案數僅35個，而且三個解釋變數並不是這麼容易測量。例如，統治者組織力量的測量，不管是採用與反對勢力相比的

¹ 兩位作者將混合政體廣泛認定為選舉競爭（electoral competition）與不同程度威權國家（varying degrees of authoritarianism）與的結合（頁1）。但是他們在書中並未對混合政體的分類或定義多作著墨，也沒有討論競爭性威權與其他混合政體次類型的關係，即使該書副標題為混合政體。

² 例如利用國家行政資源、掌控媒體、操控司法體系等（頁19-12）。

相對力量，或是以全國來看的絕對控制力，都難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因此作者納入了所有的案例做質化分析。

本書最大的優點在於理論的簡潔性以及實證資料的豐富性。作者僅用三個變數，而且同時解釋兩個不同方向的发展（民主化與維持威權）。作者納入35個國家案例，雖然無法包括太多細節，但大致已包括政體的發展起源與方向。從超過一百頁的引用書目以及超過三千個注釋來看，本書對於理論的建構以及實證資料的蒐集都有所貢獻。

本書存在幾個研究限制。第一個限制是其時間以及定義上的侷限，作者僅檢視冷戰後、特定政體的轉型。或許是因為對於混合政體本身的定義與操作化方面學界目前也還在討論中：不同的編碼方式及政體分類影響理論的建構。³ 若要將研究成果擴張解釋不同的政體類型，則一個更全面的操作化定義是第一步。

第二個限制來自本書最大優點（簡潔性）的反面。第一，作者認為不穩定威權只發生在組織力量低、而且西方影響力高的時候，但是我認為組織力量低本身就足以解釋政權的不穩定，例如在阿爾巴尼亞、海地等國，不過他們的理論框架中沒有這類发展方向。

第二，作者認為民主化只發生在與西方連結高的國家。對於幾個低度或中度連結但是卻民主化的異例，包括貝南、馬利、烏克蘭、秘魯、迦納等國，作者在書中的解釋是雖然他們

的編碼為低度或中度連結，但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實質上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在某些時間與西方的連結度是很高的（頁340-343）。然而，作者在回覆其他學者提出的評論時卻提出不同的解釋：事實上近期的發展顯示，有許多國家都如理論預測而趨向於不穩定威權。⁴ 主要的問題在於「民主化」的定義與測量。作者並沒有區分「選舉民主」與「自由民主」，有些書中民主化案例僅被別的學者歸類在選舉民主。⁵ 如果要讓理論更完整，我認為可以加入民主鞏固（Linz and Stepan, 1996）的概念，稍微修改理論：與西方的連結度愈高，則民主化愈易發生且愈容易達成民主鞏固；與西方連結度低，仍然可能民主化，但民主鞏固的機率低。

回到主要的解釋變數，也就是與西方的連結來看，我認為西方國家的連結或是影響力不只有可能造成民主化，也有可能協助威權政體存活，端看國際行為者的目的。例如 Reno (1999) 研究非洲軍閥政治時指出，多國藉公司與外國政府為了獲取政治或經濟利益，常幫助強人統治者維持政權。如果我們要將理論延伸至其他類型的威權政體，則「與西方國家的連結」此一變項的出發點也必須考慮。例如，美國曾在拉丁美洲暗中支

³ 例如 Brownlee (2009) 將一些競爭性威權政體歸類在「選舉民主」的類別，或者有學者運用自由之家以及 Polity IV 的編碼將政體視為順序變數 (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⁴ Levitzky and Way (2011)。作者指出這類案例包括貝南、馬利、喬治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馬多瓦。或許我們可以將烏克蘭視為最新的案例，請參考：“Ukraine election 'reversed democracy', OSCE says.” *BBC News*, 2012/10/29. “Observers Denounce Ukrainian Election, Citing Abuses by Rulers”, *The New York Times*, 2012/10/29。

⁵ 例如多明尼加、秘魯、尼加拉瓜、台灣、烏克蘭、貝南、馬利、馬達加斯加，參閱 Brownlee (2009)。

持許多政變推翻民主政體，抑或在中東與許多非民主國家形成軍事同盟及設立軍事基地（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巴林等國），顯然並非必然導致民主化。另一方面，相對於與西方的連結，與「非民主國家」的連結說不定會是影響政體轉型（穩定威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例如，我們尚未能測量是否與中國的連結將增加威權政體的穩定。但這將留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若和過去的民主化研究相比，在有限的「確知」成因當中，現代化理論所論述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一直存在著爭議。例如 Geddes（1999）認為兩者之間的正相關是其中一項確知成果；Epstein 等人（2006）控制不同的政體型態（民主，部份民主，獨裁）後，發現國民所得與民主化的機率呈現顯著正相關。另一方面，Przeworski 等人（2000）則認為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鞏固而非民主化。本書的理論也可以加入關於現代化理論的論戰，反駁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聯，因為「國際因素」才是民主化的主要成因。不過我們不知道其理論是否適用除了競爭性威權之外的其他類型政體，相關的論辯仍然持續當中。

三、結論

自從「第三波」以來，民主轉型在當代的脈絡當中比過去更為頻繁、可行性更高（Schmitter, 2010）。不過，現今「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仍然少於非自由民主國家。關於民主化以及相關議題（民主鞏固、民主品質）的理論建議仍然持續當中。其中的困難

點包括：政權的轉型是動態過程，我們無法得知終點為何；政體的定義與測量方式；解釋轉型的因果關係。即使存在侷限，但民主轉型的研究已有顯著的進展，Levitzky 與 Way 對於混合政體的研究提供我們豐富的理論及經驗研究參考；相信接續的研究議程將繼續以「通則化」為目標，將理論擴展至解釋所有威權政體的轉型。

參考書目

- Brownlee, Jason. 2009. "Portents of Pluralism: How Hybrid Regimes Affect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3): 515–532.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5–21.
-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 Epstein, David, Robert Bates, Jack A. Goldstone, Ida Kristensen, and Sharyn O'Halloran. 2006.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3): 551–569.
- Geddes, Barbara. 1999.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15–144.
- Howard, Marc Morjé, and Philip G. Roessler. 2006.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s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merican*

-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365–381.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Way. 2011. “Response to Slater review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2): 388–389.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lcott, Martha Brill, and Marina Ottaway. 2009. “The Challeng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Carnegie Paper No.7*.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Philippe C. Schmitter. 2009. “Twenty-five Years, Fifteen findings.” *Journal of Democracy* 21(1): 17–28.
- Przeworski, Adam,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no, William. 1999. *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chmitter, Philippe C.. 2009. “Twenty-five years, fifteen findings.” *Journal of Democracy* 21(1): 17–28.
- Zakaria, Fareed. 1997.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6): 22–43.
- Zakaria, Fareed. 2003.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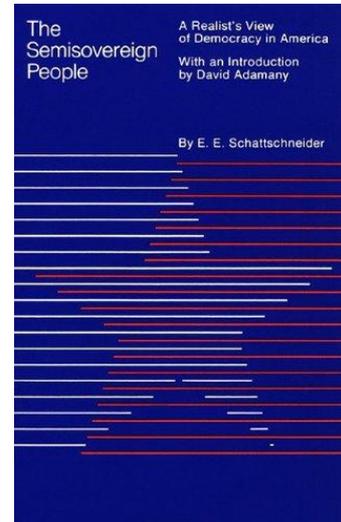
Elmer E. Schattschneider

陳芙萱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一、前言

Schattschneider 寫作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一書時，正值美國第 34 任總統艾森豪主政，現實主義當道之時。不同於其同時代的 David Easton，Schattschneider 強調政治系統的衝突面向，將民主政體視為抗衡並平衡資本主義的權力系統，認為政黨而非利益團體才是政治舞台的要角。這樣的觀點與 David Easton 強調輸入與輸出，將民主政體視為利益團體競逐場域的觀點截然不同且富有啟發。

身為 Wesleyan 大學的政治學者，雖終其一生未如同 Joseph S. Nye 或 S. P. Huntington 一般出將入相，但其在政治學上的貢獻卻是無法抹滅的。本書即為這位大師學術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共分八章介紹組織與制度的政治性：分別為衝突的擴散性 (*The Contagiousness of Conflict*)、壓力體制的範圍與政治 (*The Scope and Bias of the Pressure System*)、我們在參與誰的遊戲 (*Whose Game Do We Play?*)、衝突的替代 (*The Displacement of Conflicts*)、政治的全國化：變化中的政治維度個案研究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A Case Study In The Changing Dimensions of Politics*)、政治系統中的局限：作為政治衝突範圍的不投票現象 (*The Limit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Nonvoting As A Case Study In the Scope Of Political Conflict*)、變化中的面貌 (*What does Change Look Like?*)，以及半主權的人民 (*The Semi sovereign People*)。



書名：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作者：Elmer E. Schattschneider
出版者：Cengage Learning
出版地：New York
日期：1975
頁數：180 pages
ISBN：9780030133664

二、內容簡介

作者從「衝突」的表現形勢著手，對政黨、壓力集團、不投票等問題提出分析，依照作者的定義，**半主權 (Semi sovereign)**係指人民只是一半而非全部主權的擁有者，並未構成對政府真正的控制力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權力仍掌握在**政黨**手中。

本書的前四章構成衝突的四個維度與核心，作者認為現代政治社會以權力為中心、多元利益主體，由衝突構成現代政治的基本模式。以美國的壓力政治和政黨政治為佐證，在第一章提出衝突具有極強的擴散性的觀點。由於衝突之結果取決於旁觀者的**卷入程度 (extent)**，故衝突的**擴散程度 (scope)**決定衝突結果。另衝突的私域化 (privatization) 和社會化 (socialization) 也是作者關懷的重點，因民主政府作為使衝突社會化的工具，其有效性取決於它所掌握的權力和資源總量。而政黨透過競逐選民選票 (競爭性)，促使民主社會的政治領域不斷向外擴張。故衝突的過程與結果將取決於：衝突的範圍 (scope of conflict)、受到關注的程度 (visibility)、衝突的激烈程度 (intensity) 與衝突的向度 (direction) 等四種維度。一旦衝突的向度確定，多數派領袖就會不斷利用與對手的分野以保持本聯盟的團結。

另作者在第二章與第四章都提到，若少數派接受現有的衝突向度，系統將相對穩定。但少數派往往會採取「衝突替代 (displacement)」，將一種衝突轉化為另一種衝突，並打亂重組全部政治組合。衝突替代過程一方面

構成政治共同體實現自我更新的動力，另一方面則將衝突限定在可控制範圍之內而不致使共同體走向解體。透過凸顯那些在多數派聯盟中被掩蓋的衝突，提高這些衝突的強度和受關注程度，並最終分裂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聯盟。新的衝突取代原有衝突也會改變衝突的範圍，新衝突的向度將不同的人們吸引到新的爭論焦點上，原來介入衝突的部分民眾由於對新出現議題不關心而退出衝突，衝突的替代或位移即成為政治策略的核心。Schattschneider 並提出二種遏止衝突升級的有效方式有：一是不給其提供舞台；二是避免賦予一個公共機構干預該衝突的權力。組織本身就是對某種傾向性的動員，某些議題被組織化進入政治過程，而另一些議題則被排除在外。

第二個部分為作者所提出的政黨論，作者對當時盛行的團體理論 (group theory) 提出批評，認為美國的壓力體制，基本上是由組織化的特殊利益群體構成¹，並具有上層階級傾向，其社會經濟地位與是否參與自願性社團組織密切相關。政黨並非壓力團體的俘虜，相反的，與政黨政治相比，壓力集團的影響力相當有限，主要依靠兩黨間競逐選票來發揮影響力。因此，如一集團在某一選舉中投給兩黨的選票相等，該集團對政黨的影響力就等於零。而一黨政治，易使已掌握經濟權力者獲得政治權力。

作者以 1896 年美國的政治體制為例，認為當時競爭性政黨的衰弱，係

¹ 其中最深刻的描述是「多元主義天堂裡的弊端是天堂唱詩班的音調裡充滿了上層階級的口音。大約有 90% 的人與壓力體制無緣」。

建立在兩黨中持保守派立場的少數派不友好合作基礎上。其地方派性政治組合對政黨組織的發展具有強烈的抑制作用。而1932年美國政黨重組則與美國政治議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密切相關，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合在南部以外的地區取代原先極端地方派性的組合。兩大黨在南部以外地區得票的百分比分布曲線將呈現出不斷扁平化趨勢。政黨競爭的範圍得到極大擴展，競爭性兩黨體制成形，並對政黨權力的更疊帶來影響，增強選舉與競選組織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單一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s)和勝者全拿制(plurality elections)支撐美國的兩黨制，並歧視第三、四和第五黨…，致使它們獲得席位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在第六章中，作者提出政治系統中不投票現象的研究，因政黨的互相角逐擴大了衝突的範圍，從而使更多人由旁觀者變成衝突的參與者(選民)，青年人、低收入階層以及少數民族無法決定政治議題內容，因此選擇不投票。政黨競逐的擴大與少數弱勢的邊緣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此亦為現代民主政體(特別是美國)，成為「半主權的人民」的主因。

本書的第三部份為作者的民主觀點，第七章「變化的面向」中，作者提出在政治與經濟兩大權力系統間，美國政治體制存在持久性的張力(tension)。民主的功能即是「向公眾提供另一種權力系統」，使資本主義與政治達成均衡狀態(equilibrium)。兩大權力系統在運行規則、性質、目標上都存在明顯差異。政府所必須做的與能夠做的取決於競爭的變化。商業集團權力如果過度膨脹，且無政府權力的

相應增長對其構成平衡力量的話，輕則使政治運作市場化(如購買選票等)，重責導致大規模的市場失序。

最後，在第八章「半主權的人民」中，作者提出民主的侷限性，即在於其可操作性(operational)，「處於競爭性的政治體制中，相互競爭的政治領袖和組織以某種方式確定公共政策的選擇範圍，便於公眾參與決策。」民主成為讓民眾表達 yes 或 no 的機制，但權力仍掌握在決定遊戲內容的人。

三、評析:衝突、政黨與民主政治

任何時代皆然，衝突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角落，Schattschneider 將他長期對美國政黨(特別是共和黨)的觀察投射到書中，這種關懷當今社會的精神，體現在它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觀察。當選民在相互競爭的政治組織和領袖所提供的選擇範圍內做出抉擇時(如政黨競取選票)，這就是一種進入政治的過程。換言之，我們正在透過衝突體現我們在民主社會中所擁有的權利。

既然衝突是民主社會選舉中無可避免地，那因衝突而引發的競爭、組織、領導與責任即構成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因衝突各方在議題上，很少有一致的意見，故衝突的結果，即取決於人們的迫切要求與對衝突的優先性安排。在議題的整合過程與分裂過程中，如果衝突發展得越充分、強度越高，對立陣營各自團結的也就越緊密。如以「蘇花高速公路計畫」為例，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係起源於1990年由李登輝前總統所提出之產業東移政策。1992年底國工局開始進行探勘

和調查，1994年開始實質規劃。這條從國民黨執政後期緊急通過環評的東部高速公路，在2000-2008年間，因選舉考量，時而要興建、時而不興建。2003年，花蓮縣長補選民進黨提名的游盈隆落選後，該項政策遂一直停留在政策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的階段。除環保團體的反對外，更涉入台灣兩大政黨間的選舉議題競逐，使得中央與地方政府一直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議題衝突的階段。

在議題的衝突中，大量的旁觀者不斷被捲入。²但在一個看似爭議的公共政策中，為何非政黨力量會逐漸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形成國民黨(花蓮縣縣長)與民進黨間的議題競爭。對比衝突造成的議題競爭與排除，正如Schattschneider對政黨競爭的分析。然最後蘇花公路因大陸旅遊團在花蓮遇到土石流，導致嚴重的死亡人數，遂在輿論與政黨壓力下，由當時的花蓮縣縣長整合政策方案(蘇花公路改善工程)，排除綠黨與慈濟等邊緣政治力量，向中央政府爭取通過環境影響評估，開始進入實質的動工階段。

在西方人道主義傳統中，民主並不應利基於私利(self-interest)的酬算。但民主政治的衝突，產生於人們透過多數票控制政府的競爭過程，這種衝突，受到源於民主體制下公民彼此間想像活動所形成的共識限制。以蘇花公路政策折衝而論，我們又該如何解

決民主制度的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和少數權力的悖論呢？

關於此點，Schattschneider並沒有說明，亦或，在當時的美國，穩定的兩黨體制確能承載任何跨越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變革，使政治領袖及政黨有責任組織衝突。但今日全球化下的政治社會中，渠並無法預期在時空環境變遷下，那些他眼中的議題弱勢者(青年人、低收入階層以及少數民族)，能夠透過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表達個人意見，形成流動空間中的權力。在此同時，個人就成為一個小小的節點，即便蘇花公路動工，停工的爭議仍不斷，反倒政黨或政治領袖，對於選民的魅力，也不是那麼絕對了，這也是本文對Schattschneider提出的一點回應與補充。

²包括如慈濟功德會等宗教團體，都涉入蘇花高速公路的興建爭議。其創辦人證嚴法師呼籲，花蓮的鐵路和飛機都已經足夠了，開路不只是花錢，還會破壞山河大地，為何一定要開路不可？中時電子報 2009/01/30 高有智、何榮幸、簡東源、顏瓊玉
<http://article.denniswave.com/2240>。

新世代科技冒險家——

歸國創業家的網路競爭力

AnnaLee Saxenian

劉皓仁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一、本書介紹

在本書《*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中譯：《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創業家的網路競爭力》中，作者 AnnaLee Saxenian 觀察在矽谷地區工作服務，並返回母國成功複製「矽谷發展模式」的跨國知識技術社群 (transnational technical community)，將其定義為：「新世代科技冒險家：(The new Argonauts)」。除了在書中彰顯 1960 年代末期，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 IT 產業得以成功發展，是奠基於這群跨國知識社群的貢獻之外；並以此為主要概念，分析探討亞洲地區新興工業國家 1970 年—2000 年間的 IT 產業發展過程。

此書作者的主要關懷是：「在全球產業經濟體系中的矽谷，如何透過特定區域的政治經濟構面下的權力及產業發展結構，擴散其科技產業發展模式的影響力」；以及「母國（新興工業國家）對技術社群的吸引與技術社群對母國的貢獻」。正如同技術社群的「網路」特性，使得矽谷發展模式不容易被複製之外，跨國流動的技術社群，亦催化了二戰以降，受到後福特生產效益影響，全球代工體系所促成的區域性的 IT 產業發展機會。本文將這種基於矽谷為中心的技術社群的「網路」特性，歸納為以下六點做為本書的整體論述脈絡：

- (一) 去金融管制化的資本帶動形成之國際分工體系。
- (二) 人才與創新體制環境的建構，開放的跨區分工鍊結及科技社群的建置啟示。



書名：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創業家的網路競爭力

作者：AnnaLee Saxenian

譯者：顧淑馨

出版者：天下

出版地：台北

年份：2008

頁數：338 頁

ISBN：9789866582202

- (三) 臺灣科技網絡環境的形成。
- (四) 中國的市場開放與科技聚落的形成。
- (五) 印度的 IT 產業軟應體發展與問題。
- (六) 美國做為培育科技冒險家溫床的優勢與將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Saxenian 繼 1994 年提出《區域優勢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一書，對比美東的 128 公路與美西的矽谷 (Silicon Valley)，科技產業的發展歷程，詮釋了後者矽谷地區的成功發展，係來自於前者所欠缺的：網絡社群下的知識技術取得（知識與技術的外溢效果）與獨特的創投系統。

Saxenian 根據前著「外溢效應 (Spillover effects)」的脈絡，從宏觀的尺度分析，認為臺灣、中國、以色列以及印度的科技產業發展，都是源自於矽谷的移民社群與網絡。如果以通則化的概念分析，這些國家共通的成功基本要素：「都是始於矽谷受到重構的移民社會網絡」——並經歷人才外流到人才流通的方式傳遞內隱知識 (Tacit Knowledge)；¹但是仍各自有其不同的發展取徑：中介變項——當地政府、學習機構與跨國企業的協助或主導，最後則透過以外顯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的效應，建立各自的科技產業。在整體發展脈絡中，關鍵的要素是：一方面能將自身在矽谷學習工作的知識、經驗與技術傳承，帶回母

¹不易使用文字或影音等方式留存，只能透過情境模擬、親身感受或體會所獲得的知識即「內隱知識」。

國發展科技產業；另一方面透過與矽谷當地仍維持社群夥伴關係的跨國聯絡。扮演這種關鍵要素的發展者，即是 Saxenian 所定義的「跨國技術社群」；又稱為：「新世代科技冒險家 (The new Argonauts)」。然而真正促使這類「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複製矽谷創業經驗的原因，卻是 1960 年代開始的全球代工體系發展，以及亞裔民族在美國職場上常見的「玻璃天花板效應 (Glass Ceiling Effect)」，²所催生的人才跨國流動。

而本文認為此書隱含的真正目的，是作者希望透過探討新興工業國家科技產業發展的興衰歷程，警示美國自 2000 年以降的科技發展政策變化，對於矽谷地區，乃至整個美國及世界科技產業體系可能面臨的隱憂。

二、本書評析

書中作者特別對於臺灣的發展進行了較多著墨，除了表明本書的研究源起是始於臺灣之外；另一個鋪陳的論述脈絡則是中國的科技產業的基礎，係源自於臺灣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輸入中國的「產業鑲嵌 (embeddedness: 楊友仁、夏鑄九, 2005)」；在 2000 年後中國表面上推出的租稅減免等獎勵措施，誠然是個吸引包括臺商在內的外資投入中國進行

²「玻璃天花板」一詞，是 Morrison 在 1987 年的一篇文章：〈*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Can Women Reach the Top of America's Largest Corporations?*〉中首先使用的概念。玻璃天花板基本上的意涵，係指女性或是少數族群沒辦法晉升到企業或組織高層，並非是因為他們的能力或經驗不夠，或是不想要其職位，而是組織似乎設下一層障礙，這層障礙甚至有時看不到其存在。

「IT 產業」投資的原因，但是實際上背後的成功發展推手，是透過矽谷與臺灣移殖的 IC 製造技術（臺灣居多）與產業管理知識（臺灣）以及資本（矽谷與臺灣）所催化。

回顧臺灣的科技代工產業成功發展的歷程，除了典型的發展型國家政府高度的政策干預所奠基的工業化基礎；新世代科技冒險家的歸國投入，與李國鼎先生不間斷的奔走努力下，歷經近二十年方得以遂行發展。中國的發展典範，則是來自於 1978 年經改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強力政策競合，以及高度彈性化的發展策略，再加上臺商的各種直接與間接協助（Wang and Lee, 2007）。印度的科技產業發展，則不如臺灣與中國的順遂，而一直呈現問題。這歸因於當地相對素質較低的勞動力，以及政府部門的低效率與貪污現象；雖然透過「新世代科技冒險家」與「跨國公司」的努力，在改進「生產環境」與「當地政府效率」之後，也產生了一定規模的成果，並以「跨區新創公司的模式」經營。但是在 2006 年的資料上，由於印度缺乏地方性科技社群的互動，以及跨國科技產業的實體生產研發過程中所無法避免的「共時性」問題；³再加上印度仍存有家族企業「父傳子」的現象，阻礙了「專業經理人」的產業經濟文化的形成。因此作者對印度未來的科技產業的榮景，抱持相對悲觀的態度；這部分作者關懷所表達的意涵，也可能是臺灣目前整體大型產業發展同樣存在的問題，必須加以警

³ 就全球科技代工體系脈絡而言，工業產品從設計、研發到成品制造，必須仰賴整體分工網絡的同步執行，這種零時差的訊息溝通傳遞形態，即稱為「共時性」。

惕。

根據此書的論述，本文認為結論部份 Saxenian 所提美國科技產業的隱憂：「不能只將焦點放在只著重於美國的經濟問題，並怪罪於工作外包或全球化——即全球代工體系對於跨國公司母國的製造業影響為基礎，所衍生失業帶動下的經濟成長下降」，並揭示二個構面課題：

一、美國對於高品質的公立教育與研究的重視下降，將可能導致人才流入美國的減少，美國將因缺少過去賴以發展的移入科學家與工程師，面臨競爭力下降的問題。此問題在 2001 年 911 事情後，因美國的排外現象與簽證手續的更加繁瑣而逐漸浮現。

二、美國大學研究人員不斷的因必須爭取經費，將研究目標與短期安全目標相聯結，必然因此失去了關注長期且較無特定目標的基礎研究；而美國的科技創新與研究能力，亦將因缺乏基礎科學人才而逐漸退化。

就以上二構面問題所呈現的反思，則是隨著美國公立教育與研究素質的下降，將可能會因缺乏技術的創新擴散與培育，而影響到對於仰賴美國科技技術所建構的全球代工體系產業的未來生產與發展。其次，美國大學研究人員對於研究目標的轉向，所導致的基礎科學人才減少問題，亦可能會隨著「產業」與「學術」二領域的「網絡傳遞」，形成一股風氣而影響到追隨美國腳步的地區（例如臺灣、中國與印度）。此情況長期以降，除了會因學術朝向短期目標研究，降低這類地區的基礎研發能力；對於科學人力資源的培育減少，亦是個不容忽視的潛在課題。

在作者提出認為：維持「客戶」、「競爭對手」、「合作夥伴」三者間的緊密關係，並以矽谷為重心，將是未來美國持續保持科技產業競爭力的要素。那麼從這脈絡去論述，也表明了這三個元素逐漸的從該地區流失；而此部分：「是否美國的競爭力因那些國家的何種原因現象而流失」，卻是作者在本書中一個未能回顧探討——也是吾人最感興趣之面向。

就現實層面的觀察，法國跟日本的科技產業發展狀況，與 Saxenian 所分析的幾個成功典範：臺灣、中國與印度間的發展路徑頗有差異。同時法國與英國的科技產業發展，對於人才的培育面向上，是傾向於「以國家制度，對於在地本土精英的長期自我培育」；並不刻重在赴美求學、就業後，與矽谷產生人才面上的網絡關係。本文認為這三組分類國度，⁴科技產業的建構，並非來自於「科技冒險家」。那麼該反向思考的是，臺灣在面對走向科技代工產業瓶頸的現在，除了發展自主創新發展科技產業之外；更深一層的思考，是否該學習與長期規劃法國與日本對於人力資源應用的產業結構策略模式，以建構自主研发的生產網絡。

最後就作者的幾點論述脈絡，本文認為當下臺灣必須思考，是否因為逐漸缺少跟矽谷的科技社群夥伴的聯繫，而日益減少了跨國技術社群對於的「內隱知識」的提供？很顯然的，光仰賴半官方身份的「玉山科技協

會」，做為臺灣在矽谷地區的科技人才引介，與科技技術交流；是否不足以全面的引介與發展美國矽谷的人才與技術社群網絡？因此在國家發展的政策尺度上，與其溢注資源設立科學園區或吸引跨國企業的投資，不如設法營造讓技術社群願意回流，如同 1970 年代的時空背景，並提出能夠支持創業的制度與政策，是本文認為此書對於臺灣當前產業發展的重要啟示。

參考書目：

楊友仁、夏鑄九，2005，〈跨界生產網絡之在地鎮嚴與地方性制度之演化：以六東剪地區為例〉，《都市與計畫》，第三十二卷，第三期，頁 77-301。

Saxenian, AnnaLee 著，顧淑馨譯，2008，《新世代科技冒險家：歸國創業家的網絡競爭力》，台北：天下。譯自：Saxenian, AnnaLee . 2006.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xenian, AnnaLee .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J. H. and C. K. Lee. 2007.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8), 1873-1888.

⁴ Saxenian 在本書中只以一小段落，約略提出對於法國、日本與英國三個國家的科技產業發展，並未就其發展脈絡提出深入分析；本文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可就此方面進行研究瞭解。

Morality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Bernard Williams

鄭楷立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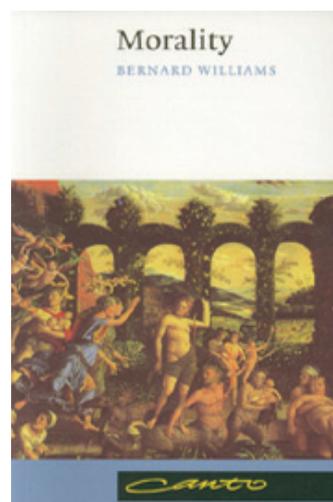
Bernard Williams 是英國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之一。本文要介紹他在 1972 年出版的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這本小書包含了十個主題，總頁數只有 110 頁，卻是一本經典之作。一般的倫理學教科書區分了規範倫理學和後設倫理學¹的範疇，在這兩個範疇內去討論倫理和道德²的問題。但是對 Williams 而言，此書在兩個意義上並非教科書，第一：此書沒有系統性的去介紹理論，且閱讀此書需要對當代三大倫理學：效益論、義務論和德行倫理學有基礎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作者行文的目的（沒有這些基礎，大體上也不會妨礙閱讀）；第二個原因是，此書放棄了許多道德哲學中重大的議題，像是：行動和道德思考中的一致性是什麼？或是道德衝突如何成為道德的一個基本事實？等等議題。但為什麼作者不照傳統教科書那樣區分規範倫理學和後設倫理學，來寫作此本小書？

在章節安排上，Williams 先從非（關）道德主義者³開始論述，接著是對於主觀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的論辯，而後是善（good）和角色的關係，道德標準和作為人的道德特性，關於神與慎慮（prudence）的問題，最後是什麼是道德？和 Williams 對於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批判。

¹ 規範倫理學在回答：什麼才是一個值得過的人生的問題；而後設倫理學是就概念的連貫性，和文句的邏輯性進行討論，但不回答“什麼是應該追求的價值”這類的問題。

² 在學術討論中，將倫理和道德視作相同的概念，見沈清松等著，《哲學概論》第二章。

³ Amoral 和 Immoral 分別指涉兩種狀況，前者是指涉一種無關乎道德的狀態，後者是指涉一種不道德的狀態。



書名：Morality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作者：Bernard Williams
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1993
頁數：120 pages
ISBN：9780521457293

筆者認為這樣的安排有兩個用意：其一，本書是對道德（哲學）的簡介，Williams 的寫作對象是普羅大眾。往常教科書一開始便區分規範倫理學和後設倫理學的寫作方式，對一個毫無基礎的人來說，就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區分。讀完後，他可能知道效益主義、義務論和德行倫理學的內容為何；知道後設倫理學在定義道德概念，和釐清理論間的邏輯問題。但關於什麼是道德，他仍舊一無所知。而 Williams 在開頭便說明什麼是非道德主義，也就是一個毫不涉及道德的人⁴是什麼樣子。這樣的起手式是重要的，知道什麼是不涉及道德的狀態，從而才能進入涉及道德的討論。就思索道德來說，從非道德和道德的區分開始，是十分直觀也不需任何基礎的。Williams 從讀者的角度來安排章節，也就符合此書作為道德簡介的目的。

其二，Williams 要面對現代社會的道德崩壞問題，也就是沒有任何客觀道德標準可以依循的困境。我們可能是不同程度的道德懷疑論者，有人認為沒有道德這件事；有人認為有道德但是每個人對於道德的定義不同；有人認為一個社群有共同的道德標準，但不同的社群間毫無共同道德標準可言。Williams 在前三章即先回應不同程度的道德懷疑論，進而轉入個人角色，道德標準和人的道德特性，由此建立思索道德的基礎。當我們一路由道德與非道德的問題，到道德懷疑論的問題，轉而建立思索道德的基礎的

過程中，最後的終點是效益主義。這是一個奇怪的結尾，因為一般教科書的起點幾乎都是效益主義，Williams 卻以效益主義作結尾。Williams 的用意在於，經過前面九章批判道德懷疑論並建立道德基礎後，才得以檢視效益主義的優劣為何。以效益主義收尾，另外可以連結至 William 批判效益主義的作品：*Utilitarianism : for and against*.

二、非道德主義、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

Williams 將非道德主義者的討論放在第一章，饒富趣味。常常可以聽到有人說，這件事無關道德，在這件事上沒有道不道德的問題，不要跟我談道德。Williams 一開始要界定的就是什麼是非道德主義者。他所界定的非道德主義者某種程度上與瘋子無異，沒有固定的意向，幾乎是不可預測的從事各種行為，有時為善，有時為惡。一個真正無關乎道德的狀態，在 Williams 的描繪中，是和瘋子無異；進一步的說，一個無涉道德狀態的人，是無法持續一致並且有條理的宣稱某個道德主張（包括"沒有道德"的這個主張）。

藉由定義非道德主義者後，可以得知，當某人一致且有意識的要求某件事是無關乎道德的這個命題時，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立場。因為他有穩定持續的意向和指涉，這便是一個明確的道德要求。在此的結論是，人很難是非道德主義者，也就是我們幾乎無法不涉入道德範疇和議題之中。當討論完"非道德"所指涉的對象後，下一

⁴ 再次強調，非道德主義者，指涉的是一個完全外於道德範疇的人。而不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像是石頭或植物，便是完全外於道德範疇的存在。

步便是道德所指涉的內容為何。

Williams 接續要對付倫理學中的重大難題：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主觀主義常見的說法像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所以你不要評斷別人行為的好壞對錯；或是道德就像吃東西一樣，每個人選的食物不一樣，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可以說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壞；而關於相對主義的說法像是：每個文化社會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不要去批評別的文化社會的價值觀的好壞。這裡可以看到，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是類似的，只是一個是個人層次，一個是文化社會層次。

Williams 花了三章來論辯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的論述，在此只能簡述其精采的論證。Williams 對主觀主義的初步回應是，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便不會發生道德爭議，因為每個人擁抱什麼樣的價值是他自己的事，沒什麼好爭論的。然而在面對道德爭論時，我們通常會極力捍衛特定的道德立場。而 Williams 認為，讓我們對於特定道德議題如此瘋狂爭議的理由只有一個：在背景中，我們對於某些道德態度是毫無爭議的。不然我們到底在爭些什麼，不就是那些我們認為大家都會認同的事。再者，一個社會的價值分歧有其界限，超出了這個界限就很難維持一個社會，這便是說社會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道德同質性上。

Williams 進一步的攻擊主觀主義。主觀主義者常說：因為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所以不要對別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譴責。也因此主觀主義者對於道德往往抱持著冷漠態度，因為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所以不必非議別

人的行為。的確，如果回到價值(value)和事實(fact)⁵的區分來看，的確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可以讓我們解決道德爭議。“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的命題是正確的，但由此無法推論不要對別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譴責。主觀主義犯了邏輯錯誤，由“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這個命題出發，能作的推論是：我們無法規範別人該怎麼作，也就是說，批判別人的道德行為，或是不批判別人的道德行為，都是對的；所以每個人要怎麼作都是他自己的事，包括他想譴責別人行為的這件事。

在這樣的前題下，我可以積極的宣揚自己認定的道德價值，或是如同主觀主義者那般，冷淡的看待別人的道德行為。主觀主義者說：不要對別人作道德評價，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道德宣稱，是將自己的道德觀，夾藏在這些論述中，偷渡自己的想法。即便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我們還是可以選擇作一個積極，有道德的人，並且拒絕主觀主義者冷淡消極的處事態度。Williams 在此批判主觀主義的立場不連貫和推論謬誤。

Williams 對相對主義的回應是，相對主義宣稱：不同的文化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觀，所以我們不要對其他文化社會的價值觀進行批評。這樣的論述其實和主觀主義的論述是完全相同，而我們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回應相對主義者。但 Williams 進一步的質疑是，有什麼特殊的道德價值是專屬於某個特定團體或社會嗎？如果沒有，為什麼我們要將每個文化或社群想像成彼此毫無交集的絕緣體。Williams 進一步質疑是，為什麼要以文化或是社會為

⁵ 這樣的區分來自英國哲學家 David Hume.

單位來界定道德的界線？難道一跨出文化或社會的界線，就是另外一個道德世界了嗎？這與實際的道德經驗不符。但 Williams 強調，對相對主義的反駁不代表他支持侵略他者或帝國主義的作法。行文至此，Williams 從開始先將我們帶入道德範疇，再將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的道德懷疑論一一駁斥。在書中後半部，Williams 將接續建立思索道德的基礎，但礙於篇幅無法在此詳盡說明。

三、道德與科學

此節是 Williams 在討論主觀主義之際，參插的次論題，筆者在此獨立陳述。社會或是學界普遍不重視道德或規範性理論，而將科學立為神主牌。原因很簡單，因為道德或規範性理論是各說各話，沒有客觀標準，而科學則是可以觀察驗證，具備客觀性的學科。Williams 對此提出批判，他問：科學的確具備客觀性，而道德則沒有科學般的客觀性，但為什麼我們要用客觀與否來決定一個學科的好壞？

Williams 不只是質疑這個標準，他更進一步說，科學是用來追求客觀性法則，而道德是用來思考價值判斷，兩個學科的職責根本不同，為什麼要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不同的職責？因為道德沒有客觀性所以就不注重道德，似乎很奇怪，因為客觀性根本不是道德的職責，這樣的要求沒有道理，也是蒙昧追求科學主義的結果。人類的價值多元紛雜，當然沒有絕對的客觀性。我們該慶幸，人類的道德價值沒有絕對的客觀性，以至於每個

人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價值。這類追求科學而忽略規範性理論的作法，實在需要深切反省。

四、結論

Bernard Williams 用精簡細緻，思緒連貫的論述，讓我們直抵道德的議題。筆者在第二節對道德懷疑論和第三節道德與科學的陳述，只是書中前半部的內容，Williams 於書中後半部，對於善、角色、神、和效益主義等等議題都有精巧的論述和批判。筆者特別陳述這兩節的原因在於，道德懷疑論以及對規範性理論的忽略是常見的看法。藉由 Williams 的論證，讓我們破除那些不曾質疑的成見。這不是一本列舉道德規範或是陳述眾多理論，讓人背誦的死書。Williams 直指道德，用最直觀的質問，來檢視不同的道德議題；即便是沒有過多基礎的人也可以毫無障礙的思索道德議題。閱讀此書最大的收穫不只是對道德的認識，更多的是在 Williams 的論證下，進行思考的訓練。這是許多書籍無法提供的訓練，也是任何想要訓練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人需要具備的經典之作。

【《政治科學季評》招募編輯與審稿委員】

各位讀者您好，創刊至今已超過 38 期歷史的《政治科學季評》，每期皆有來自包括比較政治、公共行政、國際關係、政治哲學與思想、（歷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不同領域的書評或書目稿件。著眼於《政治科學季評》是一份由師生共同組成的投稿與審稿園地，這些稿件的審查和編輯歡迎且需要您的支持與襄助。

因此，若您有興趣加入季評審稿和編輯行列的話，請至以下網址填寫資料：<http://Orz.tw/mvpSJ>。未來，我們會視投稿文章屬性與您的專長和興趣領域，安排稿件給您審查。謝謝您熱情參與。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季評專屬工作信箱：poliscireview@ntu.edu.tw，謝謝！



【政治科學季評第 38 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 截稿日期：2012 年 3 月 1 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前往 <http://politics.ntu.edu.tw/?p=583#rule-3> 下載投稿表格
 - (二)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